資本擴張視域中的貨幣統合與歐元區債務危機*

賈文華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

摘要

本文認為，歐元是歐洲資本為調節區域內競爭並聯合抵禦區域外資本擴張，建構的一元多體的超國家貨幣體系，其深層次的根源在於資本擴張驅動下的經濟體系變革與重構，而貨幣統合的深化，反過來又必然推動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進一步重構，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本質上是這一重構進程中競爭力下降導致的階段性病態反應。雖然統一貨幣存在明顯的制度性缺陷，但客觀上是債務可持續性的喪失，充分暴露了歐元的結構性缺失，而這一缺失反過來又放大並加劇了危機的治理難度，歐元區面臨的因此並不必然是歐元本身的危機。

關鍵詞：

資本擴張、貨幣統合、主權債務危機

* 本文作者感謝匿名評審專家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文中可能存在的疏漏由作者負責。本文為中國大陸國家社科基金人文社科規劃一般專案「西方馬克思主義論域中的歐洲一體化研究」（批准號：12BGJ02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壹、前言

是什麼因素促成了歐盟的貨幣統合及主權債務危機？「疑歐派」認為，統一貨幣從一開始就是精英們設計的一場賭局，歐元因此是一項政治而非純粹的經濟與金融工程。統一貨幣與國家獨立預算的二元結構，必然導致嚴重的財政赤字、高失業率及貿易失衡，其未來的命運仍決定於政治家的偏好。[1]「挺歐派」則認為，貨幣聯盟是共同市場的必然性邏輯結果，危機面臨的不僅是可治癒的功能性問題，而且其本身又是強大的促進統一的力量（Crises are the great unifier），由此帶來的經濟重構使歐盟不久即可重新成為拉動全球經濟的火車頭。[2] 那麼，對於歐盟包括經濟與貨幣聯盟在內的統合，是否存在超越「疑歐派」與「挺歐派」的第三種解釋路徑？

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格利姆·卡切迪(Guglielmo Carchedi)認為，歐盟整合「基於並強化了歐洲資本的共同利益」，是資本主義發展面臨「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轉型時」的產物。[3] 新葛蘭西主義者的解讀則更具深刻性，認為歐洲統合的深化與擴大均根源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變革與重構。[4] 由此可見，「疑歐派」和「挺歐派」均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如果說「歐洲的統合本質上是調節

---

[1] Timothy Garton Ash, "The Crisis of Europe,"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5, Sep/Oct 2012, pp. 2-15; Andrew Moravcsik, "Europe After the Crisis,"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3, May/Jun 2012, pp. 54-68; Martin Feldstein, "The Failure of the Euro,"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1, Jan/Feb 2012, pp. 105-106; Steve H. Hanke, "A Political Currenc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8, 2011.

[2] Roger C. Altman, "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Vol. 92, No. 1, Jan/Feb 2013, pp. 8-13; Pedro Solbes, "A Decade of Succes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8, 2011; Hugo Dixon, "Can Europe's Divided House Stand? "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6, Nov/Dec 2011, pp. 74-82.

[3] 張余文譯，Guglielmo Carchedi 著，「進入人類第三個千年門檻處的帝國主義矛盾：一個新階段？」，Robert Albrit 等編，**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年) ，頁 245-247。

[4] Andreas Bieler, "Austria's Application to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 Neo-Gramscian Case Study of Europe,"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3, No. 1, 1998, p. 29.

與促進歐洲資本擴張, 並同時規避嚴酷國際競爭的地區性機制」，[5] 那麼統一貨幣與歐元區面臨的危機，就應置於資本積累與擴張所立足的經濟體系與產業結構中予以理解。至少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看，歐盟的金融統合以及歐元區面臨的危機，並沒有超越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範疇。[6]藉此，本文將以資本擴張和歐元區國家產業結構的變化為切入點，探究歐盟貨幣統合以及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發生機理與促動因素。

貳、資本擴張驅動下的貨幣統合

主流經濟學認為，貨幣產生於人們對市場交易成本最小化的追求，它因此是國家制度與政府法律範疇以外的經濟現象。[7] 然而，從資本主義貨幣演進史的角度來看，歷史上的貨幣從未脫離國家的維度，而其完全意義上的國家化主要完成於十九世紀。[8] 貨幣一旦被作為價值尺度和價格標準，就取得了作為流通手段的地位，其法定的清償手段被國家承認並擔保。[9] 國家據此獲得了佔有鑄幣稅的特權，貨幣也因此而成為依託於國家運行並受其操控的「領土貨幣」（territorial currency）。[10] 二戰前的英鎊和戰後的美

---

[5] Peter Cocks, “Towards a Marx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4, No.1, 1980, pp. 1-40.

[6] 關於資本主義與歐洲統合的理論討論，參見高奇琦，「西方馬克思主義視閥下的歐洲一體化」，**國際政治研究**，33卷1期，2013年，頁156-174；李政鴻、曾怡仁，「馬克思主義視角下的歐洲一體化」，**世界經濟與政治**，24 卷 11 期，2011 年，頁 82-98；賈文華，「從資本邏輯到生產邏輯：西方馬克思主義關於歐洲一體化的理論解釋」，**世界經濟與政治**，22 卷 7 期，2009 年，頁 44-51。

[7] Charles A. E. Goodhart, “The Two Concepts of Money: Implications for the Analysis of Optimal Currency Area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4, 1998, pp. 407-432.

[8] Eric Helleiner, *The Making of National Money: Territorial Currenci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USA, 2003), pp. 19-60.

[9] Bill Lucarelli, “Marxian Theories of Money, Credit and Crisis,” *Capital & Class*, Vol. 34, No. 2, 2010, pp. 199-214.

[10] Benjamin J. Cohen, *The Geography of Mone*（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USA, 1998）, pp. 8-23, 68-91.

元，雖然都作為「世界貨幣」在全球範圍內流通，但兩者從來沒有喪失內在的領土國家堅硬的內核。

然而，歐元卻是在「尚不存在歐洲合眾國的時刻誕生的，而民族國家自身又被剝脫了管理資本的職責。」[11] 從這一意義來說，歐洲經貨聯盟實際上建構了一種新型的「超主權貨幣」（bancor），其不同於傳統貨幣的特點包括：第一，突破了領土貨幣的空間組織關係。傳統的貨幣在內涵上體現為與國家重合的領土性、流通性以及政治意義上的排他性，但歐元卻超越了國家的領土主權界域，其領土性、流通性以及排他性等，主要立足於以歐元區為基礎的共同體領土邊界，而國家在喪失了傳統的貨幣獨佔權的同時，又在區域層面共用了這些權力。第二，實現了趨向於一元化的超國家轉化。完全意義上的領土貨幣實際是貨幣國家化的產物，具體包括國家認同、鑄幣稅收益權以及宏觀經濟控制權等。歐元的成效在於使歐盟內原有的跨國家「多元多體」的貨幣體系，轉變為「一元多體」的超國家貨幣體系，國家所固有的貨幣認同、鑄幣稅收益及經濟控制等獨佔權，隨之外化於區域性超國家權力機構。

對於這一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真正付諸實踐的「超主權貨幣」，政府間主義者傾向於將其理解為成員國基於利益測算，特別是圍繞德國統一問題而達成的國家間妥協，新功能主義者則堅信歐元是經濟統合深化的必然結果。然而，「歐洲統合及其制度建構，根本上是服務於資本主義發展的補充性治理機制」。[12] 歐盟包括貨幣統合的主旨因此在於「抵制美國的資本擴張，以及保障歐洲形成中的超國家壟斷資本家階級的利益」，[13] 其促動因素據此可區分為外部與內部兩個類別。

---

[11] 周思成編譯，Samir Amin 著，「薩米爾·阿明論國際金融危機後的世界發展道路」，**國外理論動態**，第 20 卷第 6 期，2011 年，頁 20-24。

[12] Bob Jessop, “State and Regula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Failure of the Lisbon Agenda,” *Competition & Change*, Vol. 10, No. 2, 2006, pp. 145-52.

[13] E. Mandel, *Europe versus America? Contradictions of Imperialism*（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pp. 55-94.

就外部因素而言，金本位制下的貨幣國家化，意味著國家提供了合法的並被社會承認的法幣，其運行立足於中央銀行基於黃金儲備的可兌換性。[14] 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結果，霸權國的貨幣必然將作為「世界貨幣」承擔國際結算與支付職能，霸權國由此實現了大規模的資本集中和貿易流動。然而，國際貨幣體系作為一個跨國資本價值再分配機制，本身就蘊含著嚴酷的國家間競爭。隨著美國全球性霸權的建立，以英鎊為中心的戰前體系也實現了向美元為核心的戰後體系的過渡。[15]

如果說黃金本位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曾為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相對穩定的金融環境，那麼「美元本位制」的牙買加體系，則成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動盪的根源。[16] 黃金的非貨幣化實際上創制了一個「無體系的體系」，國際結算中鑄幣需求產生的貨幣局限，已被美元「黃金化」帶來的更大的彈性所超越。[17] 美國不僅借此成功地克服了「特裡芬悖論」的困境，並且獲得了操控國際貨幣體系攫取鑄幣稅收益的絕對壟斷權。[18] 與此同時，美國為緩減其固有的債務型通縮壓力，不斷通過操控美元向其他經濟體輸出脆弱性，從而使國際金融市場陷入了一個危機不斷的震盪境地。

面對美國金融資本的劇烈擴張，歐洲資本顯然不會坐以待斃。然而，即便是法德這樣的歐洲「大國」，都不具備單獨抗衡美

---

[14] Bill Lucarelli, “Marxian Theories of Money, Credit and Crisis,” *Capital & Class*, Vol. 34, No. 2, 2010, pp. 199-214.

[15] 賀欽編譯，Ramaa Vasudevan 著，「國際金融體系的歷史演進與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基於馬克思貨幣理論的分析」，**國外理論動態**，第 19 卷第 6 期，2010 年，頁 1-8。

[16] 7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的拉美貨幣危機，1977-1978 年的西方貨幣危機，80 年代初的拉美債務危機，1992- 1993 年的歐洲貨幣體系危機，1994 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機，1997 年的東亞金融危機，1998 - 1999 年的巴西貨幣危機等，都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牙買加體系」導致的惡果。

[17] 溫愛蓮譯，Robert Skidelski & Vijay Joshi 著，「凱恩斯、全球失衡與當今國際貨幣體系改革」（Keynes, Global Imbalances,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 Today），**國外理論動態**，第 20 卷第 2 期，2011 年，頁 41-45。

[18] 王姝編譯，Michel Hudson 著，「美國金融資本綁架世界經濟：邁克爾·赫德森訪談」，**國外理論動態**，第 17 卷第 7 期，2008 年，頁 24-31。

國的實力，以歐共體為依託的聯合應對便成為歐洲資本的必然選擇。正如彼得·科克斯所言，歐共體在職能上與國家一樣服務於資本積累的需求，其對外作為的主旨包括「為出口導向型經濟的高增長率提供保障」，同時「以集體的力量抗衡美國霸權」。[19] 如果說「蛇行於洞」是歐洲資本在《史密森協議》框架內擺脫美國資本制約的初步努力，那麼「聯合浮動」以及歐洲貨幣體系的建立，則意味著以德國為首的歐洲資本，將通過制度再構抗衡美國資本的擴張。隨著《德洛爾報告》的出臺及《馬斯垂克條約》的實施，通過統一貨幣與美元分割國際金融市場已成定局。

需要指出的是，歐洲資本80年代立足於「積極統合」的「去國家化」重組，不僅明顯強化了經濟的集約化水準，而且在區域層面進一步深化了國際分工。其結果一是促進了成員國間經濟的互補性與相互依存度，二是在實體產業及貿易領域逐步形成了「准國家化」的經濟集團，從而為在金融領域聯合抗衡美國資本奠定了基礎。隨著歐元的問世，美、歐、日「三巨頭不僅在生產世界是一個現實，而且在金融世界也成為現實」。更為重要的是，「歐元標誌著地緣政治的一個轉換，標誌著從美國支配的世界體系向多中心世界體系發展的決定性轉捩點」。[20]

然而，不平等性是資本主義立足的基礎。歐洲資本的集團化主要是在德國的主導下實現的，歐元很大程度上也是德國馬克在區域層面的複現。[21] 立足於國家的其他資本之所以追隨德國資本，一是由此帶來的規模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歐洲資本主義金融體系固有的脆弱性，二是統一貨幣使德國與其他成員國分享了鑄幣稅收益權。儘管德國資本佔有的份額明顯高於其他成員國，但對其他國家而言，歐元畢竟不是等同於美元的「外國」貨幣。

就內部因素而言，「積極統合」對「領土市場」的「去規制化」，

---

[19] Peter Cocks, “Towards a Marx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4, No. 1, 1980, pp. 1-40.

[20]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Euro,” *Commentary*, No.7, January 1, 1999. http://www2.binghamton.edu/fbc/archive/07en.htm.

[21] Guglielmo Carchedi, “The EMU, Monetary Crises, and the Single European Currency,” *Capital & Class*, Vol. 63, 1997, pp. 85-114.

在創制跨國家的「良性」競爭環境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單一市場內立足於國家的資本集團間的競爭性張力，其作用機理即為格利姆·卡切迪曾詳盡闡釋的矛盾性「對沖趨勢」（counter-tendency）。

歐盟內的資本主義雖然沒有突破同質性存在的範疇，但各個次區域間又有著明顯的差異性，其中以法、德為主的西北歐資本主義，在技術等競爭力方面較南歐及中東歐具有顯著的優勢。[22] 在貨幣不統一的情況下，不同資本在跨國層面的價值再分配主要依靠匯率機制來實現，但這一機制卻蘊含著對優勢國與劣勢國具有共同制約力的「對沖趨勢」。

從優勢資本國的角度來看，其在跨國體系中獲取超額利潤的同時，又將提高國際市場對該國貨幣的需求，並最終導致該國貨幣升值。貨幣升值雖然不會導致總價值的增減，但卻具有價值再分配的職能，其結果是該優勢國作為一個整體在國際價值再分配體系中獲取了更大的價值。但是，該國貨幣的升值又將抑制其他國家對優勢國產品的進口，從而又制約了優勢國的價值實現訴求。[23]

考察劣勢資本國在跨國層面的運行同樣體現出「對沖趨勢」。處於劣勢的競爭者為確保國外市場傾向於實施貨幣貶值，以期促進出口並提高以本幣計算的利潤。但是，該國因本幣貶值在國際層面實現了更少的價值，並且其總價值的實現隨出口量的增加相對於使用價值呈下降趨勢。這一價值缺失更多地將由該國的進口資本承擔。貨幣貶值將促使進口商為單位進口產品支付更多的價值，其結果是該國資本作為一個整體並不必然獲得更多的價值。[24] 另一方面，統合不僅促進了成員國間商品、資本、技術、勞務等的跨境流動，而且極大地提高了共同市場內跨國貿易的迴圈與流轉速率，「對沖趨勢」因此較非統合條件下具有更加顯著的制約力，構建以統一貨幣為核心的區域性金融體系，因此成為優勢資

---

[22] Greg Albo and Alan Zuege, “European Capitalism Today: between the Euro and the Third Way,” *Monthly Review*, July-August 1999, pp. 100-119.
[23] Guglielmo Carchedi, “The EMU, Monetary Crises, and the Single European Currency,” *Capital & Class*, Vol.63, 1997, pp. 85-114.
[24] Ibid.

本與劣勢資本共同的選擇。

需要指出的是，歐洲資本的金融統合，既體現出經典馬克思主義資本集中與壟斷的部分特點，同時又超出了傳統意義上的壟斷。一方面，競爭是資本的常態化運行方式，而「壟斷是競爭的邏輯結果」。擁有壟斷性實力的資本，通過行使壟斷權力來操控市場、行業投資以及限制競爭對手，其目的在於降低風險，提高利潤。[25] 從這意義上來說，以歐元為核心的資本集約化在運行及主旨等方面並沒有超越經典馬克思主義資本集中的範疇。另一方面，傳統意義上的壟斷更多地體現為資本的惡性競爭，其「激烈程度同互相競爭的資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競爭的資本的大小成反比。競爭的結果總是許多較小的資本家垮臺，他們的資本一部分轉入勝利者手中，一部分歸於消滅。」[26] 與此不同，以統一貨幣為基礎的歐洲資本集約化進程，體現出明顯的「非對抗性競爭」，本質上是資本競爭趨向於受區域性權力「控制」和「管理」的金融化制度建構。

參、經濟重構進程中的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

如果說週期性危機是資本主義與生俱來並且始終未能克服的內生性痼疾，那麼脫胎於資本主義「母體」的歐洲統合，必然也包含有危機的「基因」。那麼，如何認識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

正統的理論認為，主權債務是一國政府以國家為信用擔保，通過締結借貸合同向他國政府或國際金融機構拆借的資金，當債

---

[25] 金建譯，John Bellamy Foster 等著，「21 世紀資本主義的壟斷和競爭」(上)，**國外理論動態**，第 20 卷第 9 期，第 2011 年，頁 5-15。

[26] 中共中央馬列著作編譯局，Karl Max and Friedrich Engels 著，**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722-724。

務國不能按合同約定的條件償還債務時便發生了主權債務危機。[27] 這一界定顯然沒有觸及主權債務及其危機的根本性內涵。從資本主義權力關係的演進歷程來看，國家作為資本積累的權力保障，在自由競爭時期更多地發揮了工具性職能。隨著資本競爭趨向壟斷化，國家不僅與資本實現了進一步的融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轉變為資本的實際持有人。從這一角度來看，主權債務屬於資本壟斷趨向國家化的極端體現，本質上是國家未來收益的資本化。其在表像上雖然體現為國家代表全社會進行的借貸，實際上是資本擴張趨向虛擬化的產物，即國家以權力為信用基礎實現的「預期稅收的資本化」。一旦資本競爭瓦解了國家的經濟及信用基礎，立足於信用的金融鏈條的虛擬化本質，「將以耗盡信用的方式顯現」，[28] 危機也就在所難免。

主權債務危機不同於普通支付危機的特點包括：第一，國家不僅擁有應對危機所需的一切權變空間，而且擁有一般債務主體不可比擬的超越法律規範的壟斷性權力。第二，不論危機以何種方式終結，作為債務主體的國家絕不會因危機而消亡。雖然借貸的信用擔保是整個國家，但債務國並沒有義務以領土等不動產抵償債務，也沒有任何權威機構擁有強迫債務國出讓其不動產的權力。第三，除信用等受到影響外，債務國並不會因違約而遭受直接的經濟處罰，並且國際法框架內也缺乏相關的規定。第四，較普通支付危機更易受到本國及外部政治與經濟環境的影響。[29]

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顯然更具複雜性，其不同於一般主權債務危機的特點包括：

第一，權力主體發生了多元化的異化。貨幣的「去國家化」導致作為債務主體的國家，不僅喪失了增發貨幣、不受限制地發

---

[27] Christian Barry and Lydia Tomitova, “Fairness in Sovereign Debt,” *Social Research*, Vol. 73, No. 2, 2006, pp. 649-694.

[28] 賀欽編譯，Ramaa Vasudevan 著，「國際金融體系的歷史演進與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基於馬克思貨幣理論的分析」，**國外理論動態**，第 19 卷第 6 期，2010 年，頁 1-8。

[29] Juan Carlos Hatchondo, Leonardo Martinez, and Horacio Sapriza, “The Economics of Sovereign Defaults,” *Economic Quarterly*, Vol. 93, No. 2, 2007, pp. 163-187.

行國債等應對危機的傳統手段，甚至也不同程度地失去了自主尋求救助的壟斷性權力。與此同時，區域層面金融秩序的「再國家化」，雖然形成了掌控歐元區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但聯盟的「經濟憲法」特別是「穩定與增長公約」，並未賦予其應對危機所需的一切權變空間，並且任何超越基礎條約授權的行動，都必需以首腦理事會框架內達成的政府間妥協為基礎，其結果是相關的權力體都不同程度地擁有預防及應對危機的權力，但每一個權力體均沒有應對危機的完整的壟斷性權力。

第二，利益主體趨向多元化。在未實現貨幣統合的條件下，危機關涉的核心利益主體很大程度上局限於債務國與債權方。然而，歐盟自《單一歐洲法令》以來的「積極」統合，事實上使成員國特別是歐元區國家在貿易、投資以及金融化資本運作等領域，融入了一個「准」國家化的制度體系。在此條件下，救助與否、如何救助、由誰救助以及動用何種儲備救助等等，均成為相關行為主體的核心利益關切，從而使歐元區危機較國家維度內的傳統危機體現出更大的不確定性。[30]

第三，責任主體趨向模糊化。以歐元為核心的金融統合，導致金融資本以及財政體系的管理與操控權，趨向於國家和超國家的二元化分化，其結果是歐元區整體性金融秩序，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一個雙重管理與雙重「失管」的矛盾境地。危機發生以後，受災國認為是歐洲央行缺乏彈性的貨幣政策促發了危機，央行以及德國等則認為是國家層面不道德的財政擴張引發了災難。責任主體的不明確性意味著危機應對主導角色的不確定性，從而使危機陷入了似救非救、愈救愈烈的困難境地。

第四，核心政策工具趨向於割裂化的異化。財政、稅收、貨幣等三大工具，歷來被視為國家確立預算規模、規範市場秩序、調節貿易流動、穩定金融秩序，以及實施分配與再分配等三位一體的政策統一體。然而，貨幣統合導致成員國規制金融市場的權力，部分外化於聯盟一級的權力機構。領土市場的「去邊界化」，

---

[30] 李磊等譯，Roger Altman 著，「衰退中的全球化：金融危機對地緣政治的進一步影響」，**國外理論動態**，第 19 卷第 5 期，2010 年，頁 73-77。

又從根本上制約了成員國以增稅緩減財政壓力的權變空間，單方面增稅有可能導致稅基外逃，國家利用稅收工具擴大財源的固有權力，因此流失於變動不居的「單一化」市場之中。不僅如此，僅剩的財政政策工具也受到了緊縮標準的制約，其結果是原本三位一體的三大政策體系因割裂化趨向於嚴重的扭曲化。

第五，「一元多體」的超國家體系，使歐元區危機體現出更加強烈的起伏性及擴散性。經貨聯盟雖然建構了相對有序的准國家化貨幣體系，但歐盟並不具備「由‘歐洲大選’所締造的那種不可或缺的政治成熟」。[31] 貨幣的區域性集約化超前於政治權力的集約化，不僅使國家喪失了應對危機的獨佔性權力，同時也使歐元區金融體系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一個多國博弈的「無政府」狀態，從而為危機的急劇放大與擴散提供了條件。

究竟是什麼因素促發了歐元區的主權債務危機？進一步而言，為什麼「歐豬五國」（PIIGS）要不斷擴大債務規模？有觀點開拓性地指出，危機「源於去工業化所導致的實體經濟的萎縮」。[32] 客觀上來看，歐元區 2009 年以來面臨著銀行、支付及增長等多重性危機，這說明問題並不僅僅局限於貨幣領域，而是資本積累所立足的整體性經濟構成出現了問題。

其一，農、林、漁業等傳統產業在經濟中的作用明顯下降。2008 年，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農、林、漁業占總增加值比重，分別較 1995 年下降了 5.7%、5.8%、2.8%、1.3%、3.4%（見圖 1）。同期內除盧森堡外的其他歐元區創始成員國，[33] 其農、林、漁業占比也體現出下降的趨勢，但幅度明顯低於希臘及愛爾蘭等國，其中降幅最大的荷蘭僅有 1.7%。[34]

其二，工業以及能源生產等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出現了明顯

---

[31] 周思成編譯，Samir Amin 著，「薩米爾·阿明論國際金融危機後的世界發展道路」，**國外理論動態**，第 20 卷第 6 期，2011 年，頁 20-24。

[32] 楊成林，「論主權債務危機的發生」，**馬克思主義研究**，29 卷 4 期，2012 年，頁 68-76。

[33] 盧森堡經濟傳統上就倚重於服務業的發展，始終是歐元區服務業發展水準最高的國家，其商業與金融服務最具優勢，占總增加值的比重長期高達約 50%。

[34] OECD Dataset, “STAN Indicators.”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

的下滑。「歐豬五國」中降幅最大的愛爾蘭，其 2008 年工業占總增加值的比重較 1995 年下降了 8.8%（見圖 2）。希臘雖然是五國中降幅最低的國家，但其工業占比始終僅高於傳統上以服務業立足的盧森堡，並且與歐元區的平均值存在巨大的差距。2000-2008 年，歐元區 17 國工業占總增加值比重的年均值為 20.88%，希臘僅為 12.99%。[35] 工業的相對萎縮並不局限於「歐豬五國」，在除盧森堡外的其他 6 個創始成員國中，比利時和法國降幅最大，兩國 2008 年的占比分別較 1995 年下降了 5.6%和 5.3%，而兩國經濟均顯現出亞健康的徵兆。[36] 2000-2008 年，比利時債務占GDP比重的年均值高達 95.9%，是負債率僅低於義大利和希臘的債務大國。法國同期內財政赤字占GDP比重的年均值為-2.78%，在 12 國中僅低於希臘、葡萄牙和義大利。[37]

其三，服務業獲得了相對快速的發展。2008 年，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服務業占總增加值比重，分別較 1995 年上升了 12.1%、9.1%、4.0%、4.7%和 7.6%（見圖 3）。服務業貢獻力的上升一定程度上是歐元區國家的共有現象。除盧森堡外，其他六國中比利時和法國的服務業增幅最大，2008 年較 1995 年增加了 6.0%和 5.6%，而德國、荷蘭、奧地利、芬蘭分別僅上升了 2.9%、3.5%、1.4%和 2.7%。[38]

---

[35] Eurostat, National Accounts Aggregates and Employment by Branch.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national_accounts/data/main_tables>.
[36] OECD Dataset, “STAN Indicators.”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
[37] Eurostat, Government Statistics.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government_finance_statistics/data/main_tables>.
[38] OECD Dataset, “STAN Indicators.”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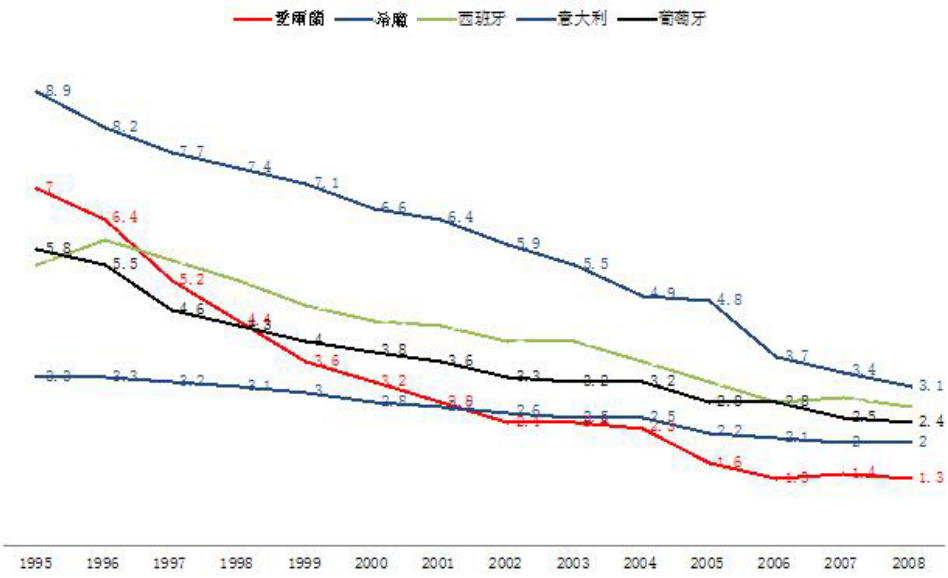

圖 1、1995–2008 年農、林、鹽、漁業占總增加值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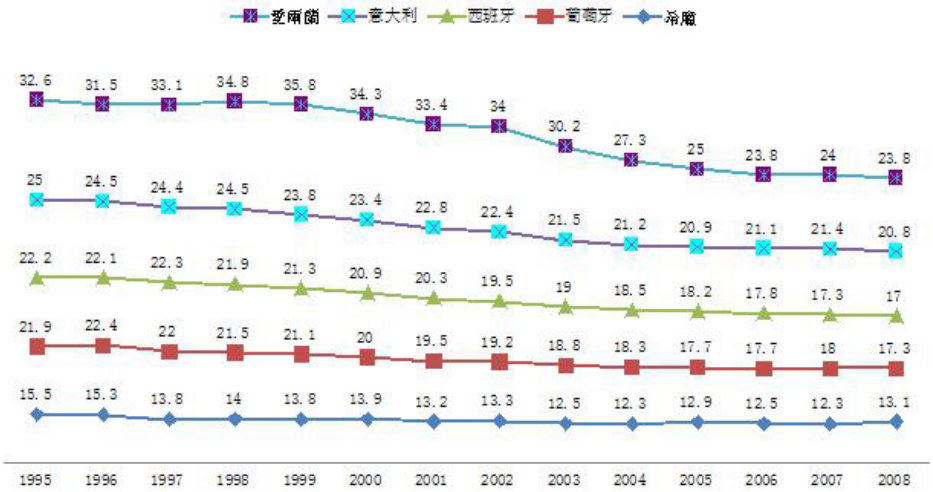

圖 2、1995–2008 年工業、能源占總增加值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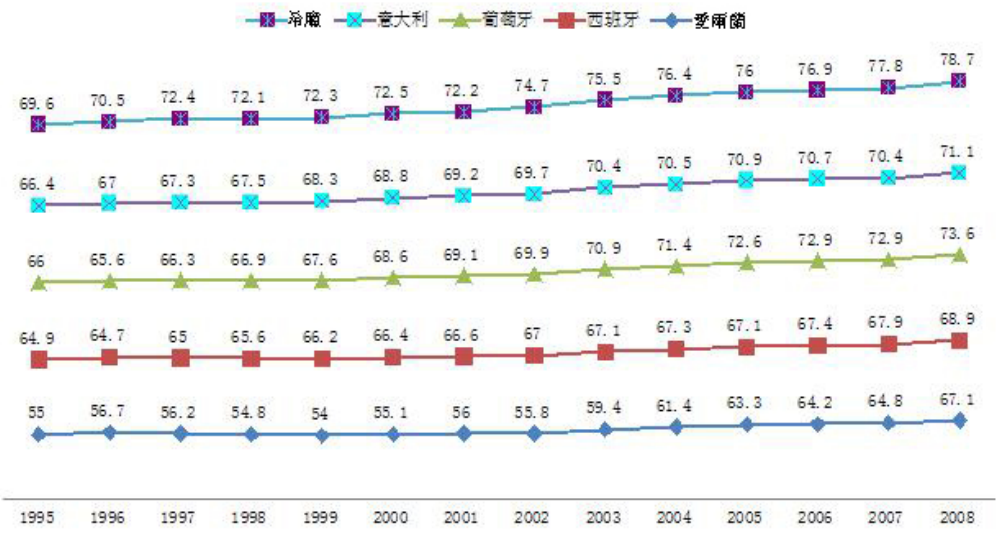

圖 3、1995—2008 年服務業占總增加值比重

資料來源： OECD Dataset: STAN Indicators, STAN Indicators 2009.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

服務業的發展本身並不必然是一種不良現象，其擴張可分為真實增長與名義增長。真實增長的動力一是製造業發展帶動的內部服務的市場化，二是收入水準提高導致的全社會對家庭、醫療、教育、通訊等服務需求的增長。[39] 名義增長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生產效率、提高服務水準、增加服務報酬，但擴張過快將增加交易費用、促進物價上漲、增加財政支出。[40] 「歐豬五國」服務業相對高速的擴張，顯然是在實體產業發展相對遲緩的背景下實現的。1996-2008 年，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服務業年均增長率，分別較工業高出 3.1%、7.1%、5.9%、4.1%和 5.4%，較農林漁業高出 14.7%、7.9%、4.4%、4.4%和 7.4%（見圖 4）。從產出的絕對值來看，五國的服務業也長期明顯超前於工農業等實體產業的發展。1995-2008 年間，愛爾蘭、希臘、西班牙、

[39] Se-Hark Park, "Intersecti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10, No. 3, pp. 245-263.
[40] 江小涓，「服務業增長：真實含義、多重影響和發展趨勢」，**經濟研究**，56 卷 4 期，2011 年，頁 4-14。

義大利、葡萄牙服務業產出年均值，分別較工業高出 2.08、2.86、3.47、3.09、3.56 倍，較農林獵漁業高出 23.14、12.65、17.84、26.61 和 20.2 倍（見圖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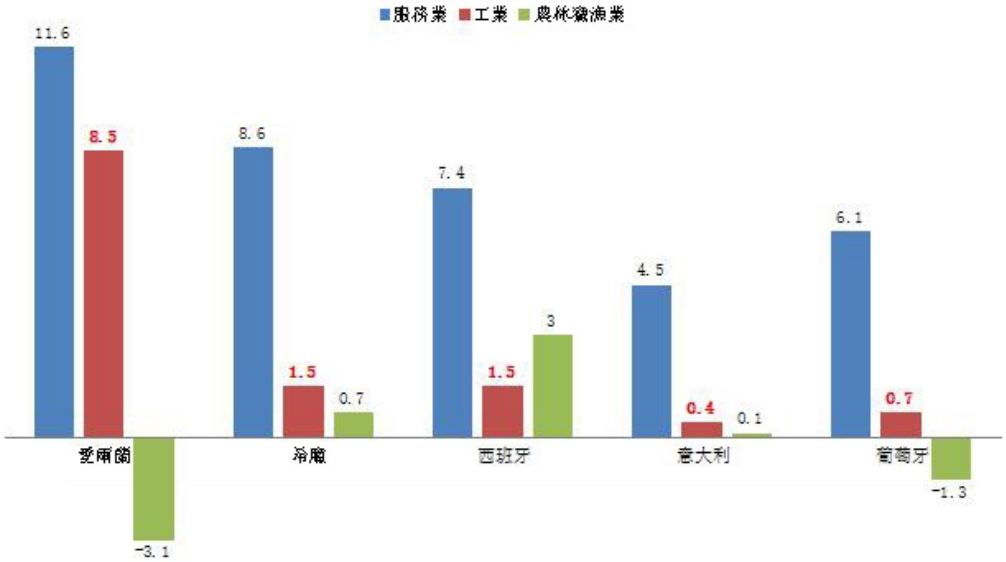

圖 4、1996—2008 年服務業、工業、農林漁業產值年增長率平均值

然而，服務業的膨脹式發展，並未使其轉變為五國資本競爭可依賴的支柱性產業，而工農業等實體產業長時期相對滯後的發展，又使整個經濟逐步喪失了原有的競爭優勢。從進出口貿易的角度來看，發展相對滯後的製造業、採礦、能源生產等傳統工業，依然是愛爾蘭和義大利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核心產業依託。兩國 1995-2008 年的工業出超年均值分別為 289 億和 244 億美元，而發展迅速的服務業則長期處於逆差狀態，同期內年均入超高達 100 億和 12 億美元。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經濟構成體現出一定的相似性。高速發展的服務業雖然長期保持著出超的態勢，但其出口盈餘無法填補工業發展相對遲緩導致的巨大貿易虧空。1995-2008 年，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工業年均入超高達 294 億、630 億和 157 億美元，而服務業年均出超分別僅有 127 億、239 億

和 39 億美元。僅從工業、農業和服務業貿易平衡的角度來看，在除盧森堡以外的其他六個創始成員國中，只有法國存在數額較大的淨赤字。1995-2008 年，法國三大產業進出口貿易年均淨逆差總額高達 57 億美元，其經濟也因此而長期面臨巨大的下行壓力（見圖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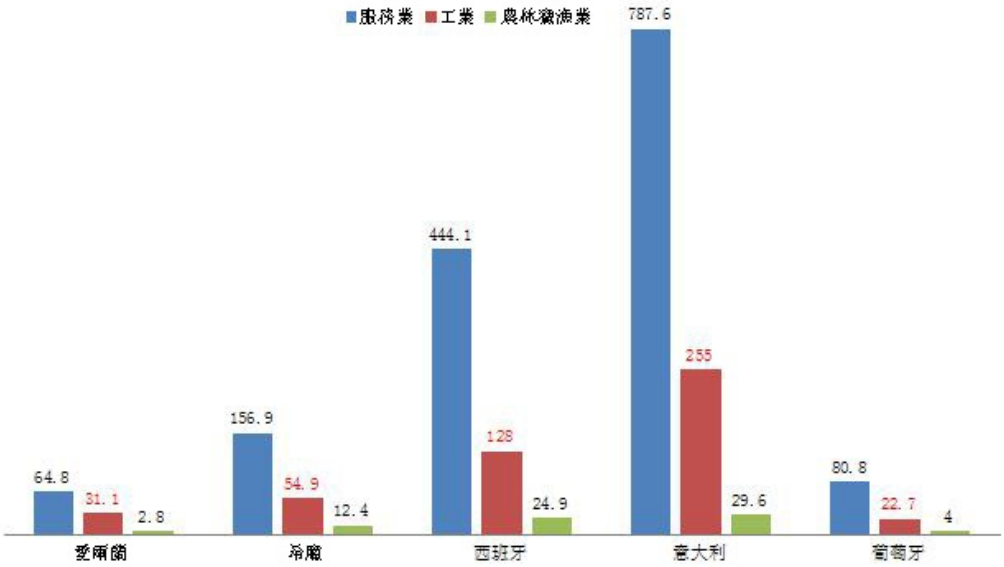

圖 5、1995–2008 服務業、工業、農林漁業年產值平均值(10 億元)

資料來源：OECD Dataset: Key Short-Term Economic Indicator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STAN Database for Structural Analysis.[41]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

[41] 1996-2008 年服務業、農林獵漁業年增長率，以及 1995-2008 年服務業、工業、農林獵漁業年產值平均值，是筆者依據 OECD 資料庫子集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STAN Database for Structural Analysis 和 Key Short-Term Economic Indicators 的年度產值及增長率資料計算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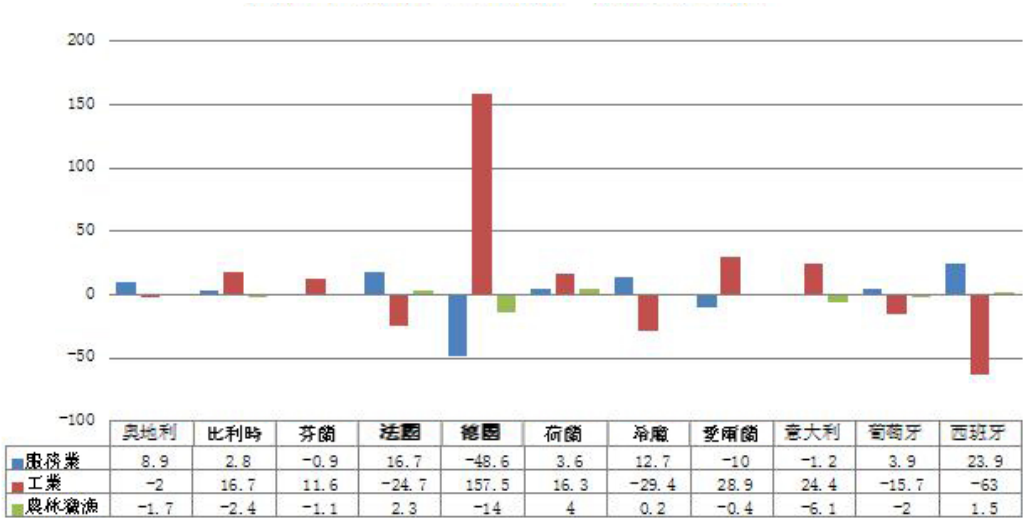

圖 6、1995—2009 年歐元主要創始成員國服務業、工業、農林漁業進出口貿易平衡年均值(單位：10 億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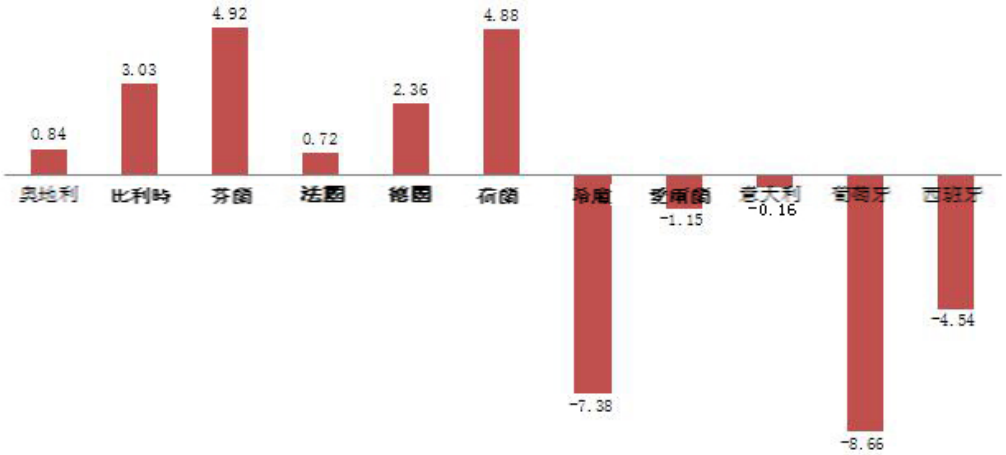

圖 7、1996—2009 年歐元區主要創始成員國經常項目平衡占 GDP 比重年均值(%)

資料來源：OECD Dataset: STAN Indicators; STAN Indicators 2009; Balance of Payments (MEI); Country Statistical Profiles.[42]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

[42] 1995-2008 年服務業、工業、農林獵漁業貿易平衡年均值，是筆者依據

在市場與貨幣雙重統合的條件下，經濟重構導致的市場需求空缺，將很快被成員國更具競爭力的產業佔據，從而導致弱勢國長時期的結構性貿易逆差。而長期的貿易逆差又對國家的總收益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影響，這一點在歐豬五國中體現的尤為突出。1996-2009 年間，葡萄牙、希臘、西班牙、愛爾蘭和義大利，經常項目盈餘占GDP比重的年均值分別為-8.66%、-7.38%、-4.54%、-1.15%和-0.46%。同期內，歐元區其他主要創始成員國經常項目盈餘占GDP比重的年均值均為正值，其中最低的法國年均值也達到了 0.72%（見圖 6）。[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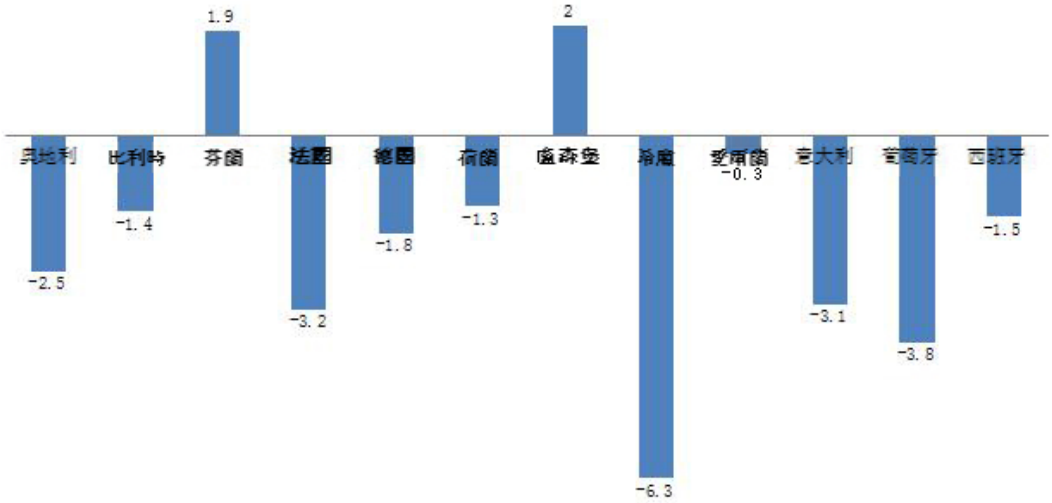

圖 8、1995—2009 年歐元區 12 個創始成員國財政赤字占 GDP 比重年均值(%)

STAN Indicators、STAN Indicators 2009 以及 Balance of Payments (MEI)的年度資料計算得出。

[43] 盧森堡因數據不全未納入圖 7 的統計與分析，但從已有的資料來看，該國的進出口貿易及經常項目盈餘均長期位列歐元區國家的前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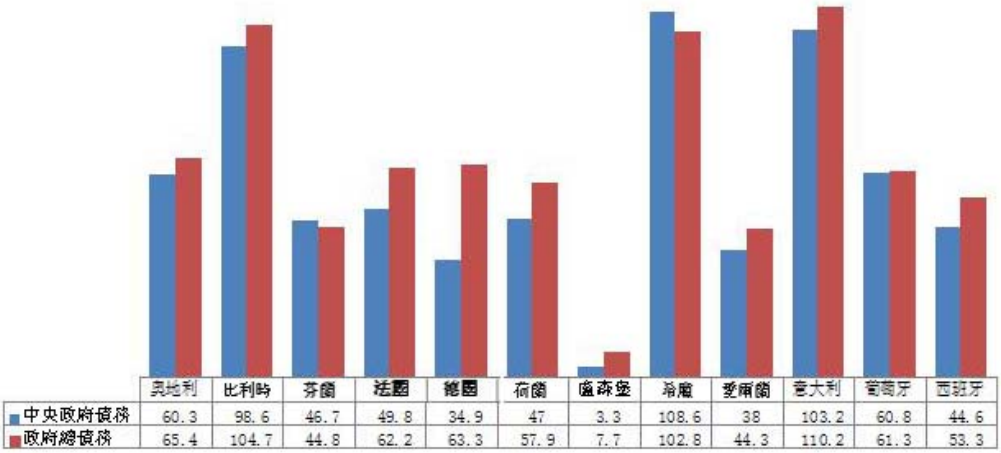

圖 9、1995─2009 年歐元區 12 個創始成員國中央及政府總債務占 GDP 比重年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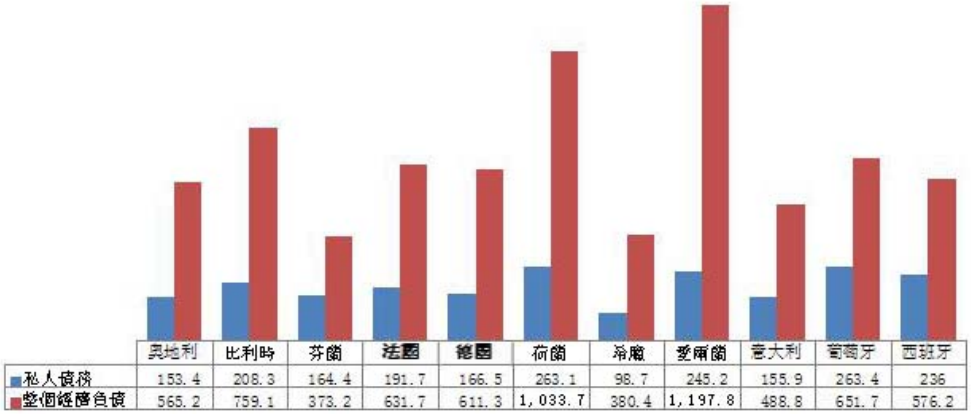

圖 10、2001─2009 年歐元區主要創始成員國私人債務及經濟負債占 GDP 比重年均值(%)

資料來源：OECD Dataset: General Government Debt-Maastricht; Central Government Debt; Financial Indicators-Stocks.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views/reports/tableview.aspx.

克服長期性收益虧空的常規化途徑主要有兩種：其一是削減財政支出、抑制消費，以緩減進口擴張的壓力；其二是增加預算赤字、擴張債務規模，以保持經濟至少短期內的有序運行，「歐豬五國」無一例外顯然均選擇了後者。只是各國的經濟樣態及面臨的困境各異，採取的權變手段也不盡相同。從財政赤字和政府負債的角度來看，希臘、葡萄牙、義大利更多地通過增加預算赤字、擴大政府債務規模來化解經常專案長期虧空導致的困難。1995-2009 年間，三國財政赤字占 GDP 比重的年均值分別為-6.3%、-3.8%、-3.1%，政府總債務占 GDP 比重的年均值分別為102%、61.3%、110%。赤字與債務負擔偏高雖然是歐元區國家經濟的一個普遍性特點，但其他多數成員國面臨的壓力一定程度上不及上述三國。其中法國的財政赤字及政府債務負擔接近於葡萄牙，同期內預算赤字與政府總債務占 GDP 比重的年均值分別為-3.2%和 62.2%。比利時經濟同期內也背負著巨大的債務負擔，政府總債務占 GDP 比重的年均值高達 104%，但其預算赤字卻長期維持在-1.4%的水準，在 12 個創始成員國中僅高於盧森堡、芬蘭、愛爾蘭及荷蘭（見圖 8-9）。

如前所述，「歐豬五國」面臨的困局各異，其經濟的非健康樣態也存在明顯的不同。僅從財政赤字和政府負債的角度來看，愛爾蘭與西班牙不至於跌入瀕臨破產的邊緣。1995-2009 年間，兩國的赤字及政府總負債占 GDP 比重的年均值分別僅為-0.3%、44.3%和-1.5%、53.3%，明顯低於「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所規定的上限標準。然而，從經濟總負債的角度來看，愛爾蘭的經濟面臨的困難卻十分顯著。2001-2009 年，愛爾蘭經濟總負債占 GDP 比重的年均值高達 1197%，位列歐元區主要創始成員國之首，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房地產業的急劇膨脹導致的巨額不良貸款，將銀行業整體上拖入了破產的邊緣。西班牙體現出類似的情況，同期內經濟總負債和私人債務占 GDP 比重的年均值分別為 576.2%和236%（見圖 10）。

英國學者厄茲萊姆·奧納蘭（Özlem Onaran）認為，此輪歐洲資本主義危機總體上仍屬於剩餘價值實現範疇內的危機，經濟層

面的原因包括：其一，有效購買力不足制約了資本的價值實現；其二，立足於新自由主義的債務驅動型積累及消費模式，只能暫時緩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的張力，一旦達到極限便會導致危機；其三，金融化驅動下的「賭場經濟」（casino economy）只注重於短期利益，其結果一方面改變了傳統的資本積累模式，另一方面又使歐洲資本主義陷入了高獲利與低產出的矛盾境地。[44]

奧納蘭的後兩點判斷無疑切中了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實質，但其關於有效購買力不足的推論卻存在進一步探究的空間。事實上，「歐豬五國」在危機來臨前的近 10 年間，其家庭及政府消費支出始終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2008 年，愛爾蘭、希臘及葡萄牙家庭消費占GDP比重，分別較 2000 年上升了 2%、2%和 3%，西班牙和義大利僅分別下降了 3%和 1%。同期內的政府消費支出，除希臘略有下降外，其他四國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見圖 11-12）。另一方面，2000-2008 年，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五國，GDP年均增長率分別為 4.9%、3.7%、3.3%、1.3%和 1.3%，[45] 這意味著家庭及政府消費支出的絕對值，總體上也處於穩中有升的狀態。

---

[44] Özlem Onaran,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in Europe, West and East,” *Monthly Review*, October 2010, Vol. 62, No. 5, pp. 18-33.
[45] OECD Dataset, *National Accounts at a Gl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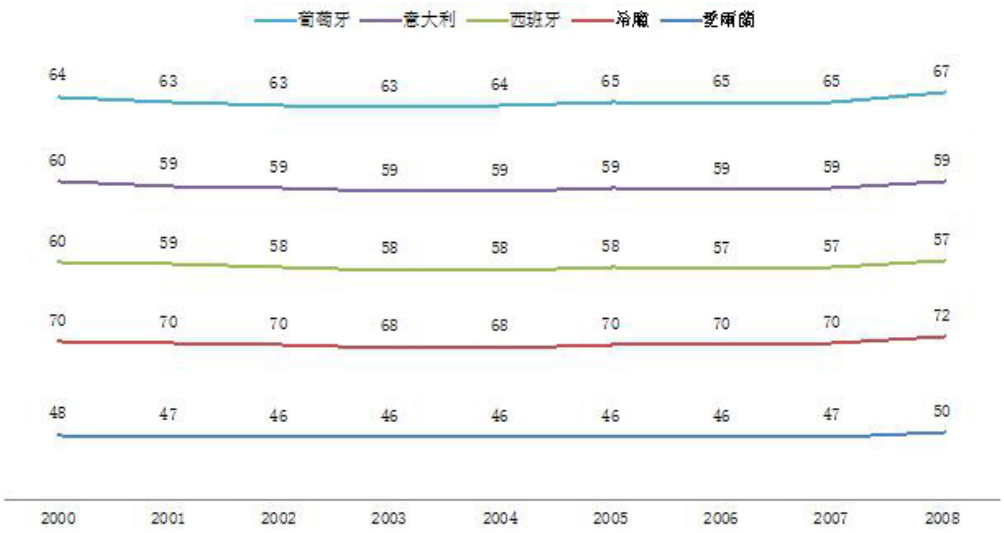

圖 11、2000—2008 年家庭最終消費占比(G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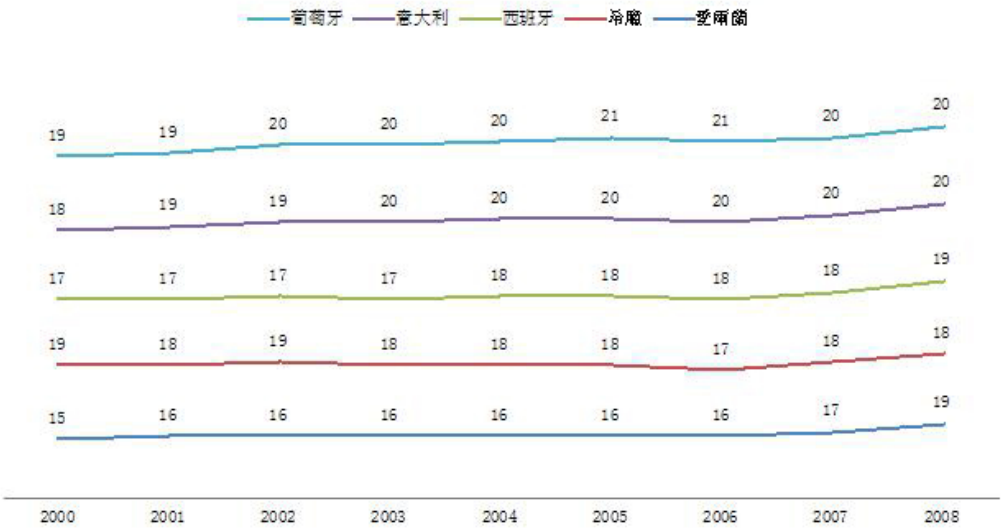

圖 12、2000—2008 年政府消費占比(G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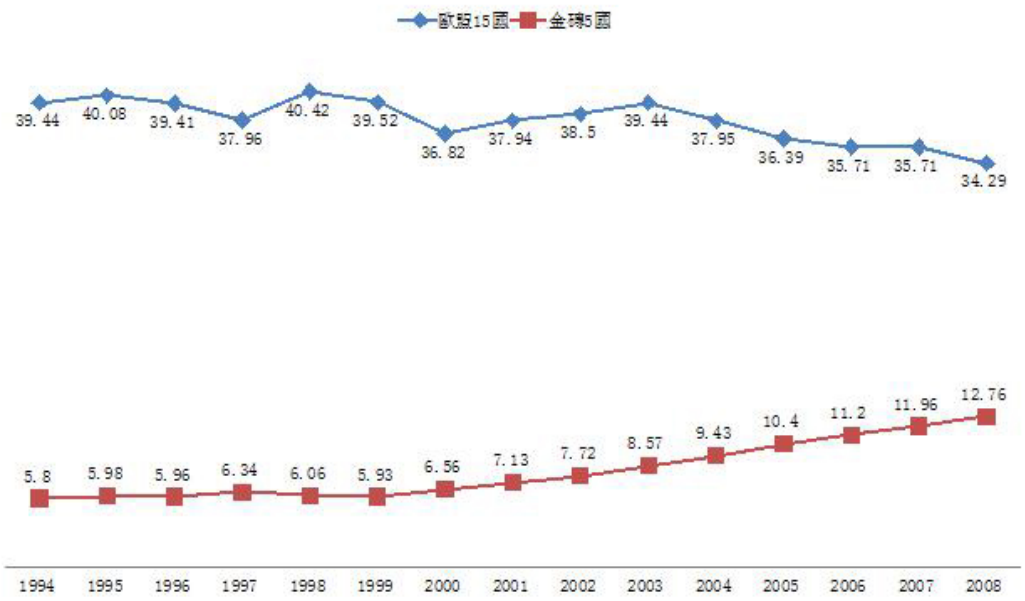

圖 13、1994—2008 年歐盟 15 國及金磚五國商品及商業服務進出口貿易總占世界比重(%)

資料來源：OECD Dataset: National Accounts at a Glance.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4*, pp. 171-184;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9*, pp. 181-194.[46]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_e.htm.

由此可見，危機更多地源於產出與消費需求的非協調性發展。在包括金融與貨幣在內的區域性統合不斷深化的條件下，「歐豬五國」經濟的競爭力體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並進一步導致了長期性的貿易逆差及巨大的財政虧空。權變之計是提高預算赤字、擴張政府及經濟的總負債規模。年復一年，寅吃卯糧，以至於最終將國家拖入了瀕臨破產的邊緣。需要指出的是，「歐豬五國」經濟競爭力的下降也不乏區域外因素的作用。自馬約生效以來，

[46] 歐盟 15 國指截止 1995 年底入盟的老成員國，金磚 5 國指中國大陸、俄羅斯、巴西、印度、南非五國。有關的資料是作者依據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4* 和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9* 中各國進出口資料計算得出。其中 1994-2003 年的資料來自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4*(pp. 169-184) ，2004-2008 年資料來自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9*(pp. 181-194) 。

歐盟便面臨來自區域外特別是新興國家日益增長的競爭性壓力。1994-2008 年，15 個老成員國的商品及商業服務進出口貿易總額占世界的比重，由 39.44%下降到 34.29%。同期內，中國（不包括香港與澳門）等「金磚國家」（BRICS）的比重，則由 5.8%上升為 12.76%，翻了一番有餘。在內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經濟競爭力不斷下降的「歐豬五國」陷入危機即成必然之勢。

肆、結論

從資本積累的角度來看，歐洲經貨聯盟本質上是歐洲金融與貨幣資本的集約化進程，溢出民族國家界限導致的超國家制度安排，其深層次的根源在於資本擴張驅動下的經濟體系重構，而貨幣統合的深化，反過來又必然推動經濟體系的進一步重構。歐盟將重構的主要原因歸結為技術進步、價格變化以及全球化的發展，其結果是以製造業為主的傳統產業，向低勞動力成本地區的大規模轉移。[47] 事實上，包括產業轉移在內的經濟重構，其主要的促動力量在於 90 年代初期以來深化與擴大高密度、大範圍的交互推進。統一大市場的建立、「申根協定」的實施以及統一貨幣的運行，無一例外地使希臘等南歐資本主義，更加充分地暴露於技術、資本等更具競爭力的西北歐資本主義。與此同時，歐盟向中東歐的多輪擴大，又使南歐的資本主義不得不面對在勞動力、場地、資源等更具優勢的中東歐資本主義的競爭。在來自高端與低端的雙重競爭壓力下，希臘等國逐步進入了一個較長週期的經濟與產業重構進程。

從結果上來看，歐洲統合每一輪的深化與擴大，都必然會促動區域範疇內更加深入與細化的國際分工，而一國經濟的健康發展，主要取決於能否在這一進程中培育出具有競爭力的優勢產

[47] Eurostat, *Europe in figures: Eurostat Yearbook 2010*,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0, p. 93.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eurostat/home.

業。就這一意義而言，「歐豬五國」及賽普勒斯等面臨的危機，本質上是經濟與產業重構進程中競爭力下降導致的階段性「病態」反應。然而，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危機的主要根源在於統一貨幣與國家獨立預算的二元性制度結構。[48]

從本文的前述分析可以看出，歐元區面臨的並不必然是歐元本身的危機。雖然統一貨幣存在明顯的制度性缺陷，但客觀上是債務可持續性的喪失，充分暴露了歐元固有的結構性缺失，而這一缺失反過來又放大並加劇了危機的治理難度。在實現了貨幣統合的條件下，歐元區國家失去了應用財政、稅收、貨幣等三位一體的政策工具，來確立本國的預算規模，穩定自身的金融秩序，有效實施分配與再分配。儘管歐元區國家面臨相同的貨幣統合壓力，但經濟結構相對合理並具有明顯競爭優勢的德國、奧地利等有效應對了這一挑戰，而經濟競爭力明顯下滑的「歐豬五國」及賽普勒斯，則因貨幣統合遞增與競爭力遞減的反向發展而相繼陷入了危機。從這一意義上來看，克服危機的途徑更多地在於產業及經濟重構基礎上競爭力的整體性恢復，而這顯然將是一條相對漫長的征程。

---

[48] 秦愛華，「『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研討會綜述」，**歐洲研究**，27 卷 5 期，2010 年，頁 150-153。

參考文獻

中文

王姝編譯，Michel Hudson 著，「美國金融資本綁架世界經濟：邁克爾·赫德森訪談」，**國外理論動態**，第 17 卷第 7 期（2008 年 7 月），頁 24-31。

中共中央馬列著作編譯局（編譯），Karl Max and Friedrich Engels 著，200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江小涓，2011,「服務業增長：真實含義、多重影響和發展趨勢」，**經濟研究**，第 56 卷第 4 期（2011 年），頁 4-14。

李政鴻、曾怡仁，「馬克思主義視角下的歐洲一體化」，**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24 卷第 11 期（2011 年），頁 82-98。

李磊等譯，Roger Altman 著，「衰退中的全球化：金融危機對地緣政治的進一步影響」，**國外理論動態**，第 19 卷第 5 期（2010 年 5 月），頁 73-77。

金建譯，John Bellamy Foster 等著，2011/9,「21 世紀資本主義的壟斷和競爭」(上) ，**國外理論動態**，第 20 卷第 9 期，頁 5-15。

周思成編譯，Samir Amin 著，「薩米爾·阿明論國際金融危機後的世界發展道路」，**國外理論動態**，第 20 卷第 6 期（2011 年 6 月），頁 20-24。

高奇琦，「西方馬克思主義視閥下的歐洲一體化」，**國際政治研究**，第 33 卷第 1 期（2013 年），頁 156-174。

秦愛華，「『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研討會綜述」，**歐洲研究**，第 27 卷第 5 期（2010 年），頁 150-153。

張余文譯，Guglielmo Carchedi 著，「進入人類第三個千年門檻處的帝國主義矛盾：一個新階段？」(Enter the Third Millennium Threshold at Imperialistic Conflict: A New Stage?)，Robert Albrit 等編、張余文譯，**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2003 年)。

賀欽編譯，Ramaa Vasudevan 著，「國際金融體系的歷史演進與當

前國際金融危機基於馬克思貨幣理論的分析」，**國外理論動態**，第 19 卷第 6 期（2011 年 6 月），頁 1-8。

楊成林，「論主權債務危機的發生」，**馬克思主義研究**，第 29 卷第 4 期（2012 年），頁 68-76。

賈文華，「從資本邏輯到生產邏輯：西方馬克思主義關於歐洲一體化的理論解釋」，**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22 卷第 7 期（2009 年），頁 44-51。

溫愛蓮譯，Robert Skidelski & Vijay Joshi 著，「凱恩斯、全球失衡與當今國際貨幣體系改革」（Keynes, Global Imbalances,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 Today），**國外理論動態**，第 20 卷第 2 期（2011 年 2 月），頁 41-45。

英文

Bieler, Andreas. “Austria's Application to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 Neo-Gramscian Case Study of Europe,”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3, No. 1（1998）, pp. 27-43.

Moravcsik, Andrew. “Europe after the Crisis,”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3（2012）, pp. 54-68.

Cohen, Benjamin J. *The Geography of Money*（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Lucarelli, Bill. “Marxian Theories of Money, Credit and Crisis,” *Capital & Class*, Vol. 34, No. 2（2010）, pp. 199-214.

Jessop, Bob. ”State and Regula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Failure of the Lisbon Agenda,” *Competition & Change*, Vol. 10, No. 2（2006）, pp. 145-152.

Goodhart, Charles A. E. “The Two Concepts of Money: Implications for the Analysis of Optimal Currency Area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4（1998）, pp. 407-432.

Barry, Christian and Tomitova, Lydia. “Fairness in Sovereign Debt,” *Social Research*, Vol. 73, No. 2（2006）, pp. 649-694.

Mandel, E. “Europe versus America?” *Contradictions of Imperialism*（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Helleiner, Eric. T*he Making of National Money: Territorial Currenci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Eurostat, *Government Statistics*,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government_finance_statistics/data/main_tables.

Eurostat, *Europe in Figures: Eurostat Yearbook 2010*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0).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eurostat/home.

Albo, Greg and Zuege, Alan. “European Capitalism Today: between the Euro and the Third Way,” *Monthly Review*（1999）, pp. 100-119.

Carchedi, Guglielmo. “The EMU, Monetary Crises, and the Single European Currency,” *Capital & Class*, Vol. 63（1997）, pp. 85-114.

Dixon, Hugo. “Can Europe’s Divided House Stand?”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6（2011）, pp. 74-82.

Immanuel Wallerstein, 1999/1/1. “The Euro,” *Commentary*, No. 7, http://www2.binghamton.edu/fbc/archive/07en.htm.

Hatchondo, Juan, Carlos Leonardo Martinez, and Horacio Sapriza, “The Economics of Sovereign Defaults,” *Economic Quarterly*, Vol. 93, No. 2（2007）, pp. 163–187.

Feldstein, Martin. “The Failure of the Euro,”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1（2012）, pp. 105-106.

OECD Dataset, “STAN Indicators,”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

Eurostat, National Accounts Aggregates and Employment by Branch,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national_accounts/data/main_tables.

Onaran, Özlem.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in Europe, West and East,” *Monthly Review*, Vol. 62, No. 5 （2010）, pp. 18-33.

Solbes, Pedro 2011. “A Decade of Succes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Cocks, Peter. “Towards a Marx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4, No.1（1980）, pp. 1-40.

Altman, Roger C. “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Vol. 92, No. 1（2013）, pp. 8-13.

Park, Se-Hark. “Intersector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10, No. 3, pp. 245-263.

Hanke, Steve H. 2011. “A Political Currenc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sh, Timothy Garton. “The Crisis of Europe,”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5（2012）, pp. 2-15.

Monetary Integration and the Euro Zone Debt Cri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Expansion

Wen-hua Jia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bstract

The euro is a kind of supra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which constructed by the European capital in order to joint to regulate competition in the region and resist the expansion of foreign capital. Its roots lie in the deep economic system reform and reconstruction driven by the capital expansion. While deepening monetary integration, euro in turn is bound to promote the further reconstruction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 Euro zone sovereign debt crisis naturally is "morbid" reaction to this reconstruction process with declining competitiveness. Although the single currency regime has obvious defects, but the objective is the loss of debt sustainability, fully exposed the structural absence of the euro, and this in turn amplified and exacerbated the difficulty of governance, the euro zone faces Therefore, the euro regional crisis is not necessarily the euro crisis.

Keywords:

Capital Expansion, Monetary Integration, Sovereignty Debt Crisis